



# 小说面面观

Aspects  
of the Novel

[英]E.M.福斯特 著 朱乃长 译

- 本书四个第一：
- 第一次推出这部世界经典的英汉对照本
  - 第一次公开评论五个中文版本的翻译得失
  - 老教授第一次把自己的译文公之于众，任人评说
  - 第一次给大学文科师生提供如此详尽的注释

英汉对照

# 小说面面观

Aspects  
of the Novel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面面观：英汉对照/(英)福斯特著；朱乃长译。—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2

ISBN 7-5001-0844-3

I. 小… II. ①福… ②朱… III. 英语－对照读物，文学  
研究－英、汉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758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1-4001 号)

---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电 话 / (010)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68002480

E-mail: ctpc@public.bta.net.cn

http://www.ctpc.com.cn

策划编辑 / 毕小元

责任编辑 / 毕小元

封面设计 / 张 红

排 版 / 宏宇电脑服务中心

印 刷 /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 / 880×1230 毫米 1 / 32

印 张 / 14.75

版 次 /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2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 5000

---

ISBN 7-5001-0844-3 / H · 252 定价：29.6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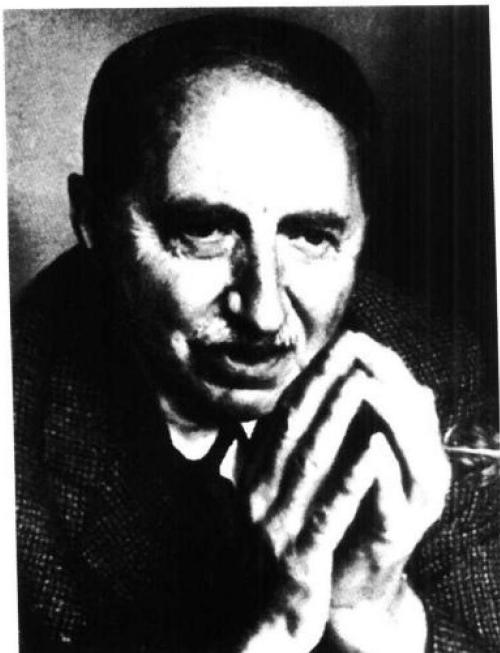
**ASPECTS OF THE NOVEL**

**by E. M. Forster**

**Copyright © The Provost and  
Scholars of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1927, 1974**

# 作者简介

E.M.福斯特 (1879-1970)



生于英国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位建筑师。他于1901年自剑桥大学毕业后，到希腊、意大利旅行，两年后返回英国，开始他的写作生涯。他生前即在英国小说界享有盛誉，且与劳伦斯(D.H.Lawrence, 1885-1930)并称于世，其作品包括许多短篇和六部长篇小说，尤以《印度之行》享誉国际。此外他还作有关于社会、政治、哲学方面的大量论文，使他成为二十世纪里为数不多的哲人之一。盖福斯特虽被当作一个严肃而孤僻的作家，但他的作品却始终不渝地寻求人与人相处的和睦、社会生活的和谐、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和融合。

1927年，福斯特应邀在剑桥大学主持“克拉克讲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长篇小说的演讲，后汇集成书，名为《小说面面观》。此书问世以来，被公认为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因作者就一个公众对之有着广泛兴趣的题目，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成就卓著、享誉世界的小说家所笃信并遵守的独特且锐利的见解的一部文学评论专著。盖福斯特不但借鉴了前人的创作经验和研究成果，而且凭着他自己二十多年的实践积累起来的创作心得和体会，就小说诸多的重要方面和关键问题做出了发人深思的、富于创新精神的总结。事实证明，《小说面面观》已经对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产生了普遍而富于指导意义的作用，被誉为二十世纪研究小说艺术的经典著作之一。从它问世以来，《小说面面观》在半个多世纪里印行了数十版，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影响所至，遍及世界各国。

# 注释范例

本书的注释分为脚注和尾注两种。

脚注主要引自《小说面面观》的中文译本的词语或句子，以小号阿拉伯数字①，②，③……，标志在加注的词语或句子右上角，注释的内容依次排列在每页底部。每条脚注的符号①②③④⑤，表示紧随其后引号内的文句摘自①花城内部发行版、②花城苏炳文先生译本版，③花城苏炳文先生译、黄锡祥先生校的修订版、④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在《小说经典三种》里的方土人先生译本版，以及⑤上海译文出版社收在《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里的葛林先生译的《小说面面观》中的第四章的译文。

台北志文出版社1973年出版、1986年再版（再版本和1973年版内容相同）的译本，则因其内容和花城内部发行版完全一样，可相互参照，不另标志。

查核每一条脚注中引文的出处的方法如下：

1. 标在每一条引文前面的①、②、③、④、⑤表示该引文出自那一种版本，引文后面圆括弧内的符号及阿拉伯数字“p. 33”或“pp. 33 - 35”，即引文出自该版本的页码。举例如下：

① “………………” (p. 33) 表示该引文出自花城内部发行版33页。

① “………………” (p. 33 - 34) 该引文出自花城内部发行版33 - 34页。

②③ “………………” (p. 33) 该引文分别出自花城苏炳文先生译本版和苏炳文先生译、黄锡祥先生

校的修订版的页码相同的书页上（即尽管出自不同的两本书，但各自的页码正好相同），引文的内容也复相同。

如出自不同版本和不同页数而引文内容相同，则以(p. 33/34)表示。例如：

②③“.....”(p. 33/34)该引文分别出自花城苏炳文先生译本版的33页和花城苏先生译黄先生校的修订版的34页。余类推。

2. ①②③④⑤还在脚注中依次表示《小说面面观》各种不同版本的译文，如：①表示花城内部发行版的译文；

②表示花城苏炳文先生译的版本译文；

③表示花城苏炳文先生译、黄锡祥先生校的那个修正版的译文；

④表示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小说经典三种》内的方土人先生的译文；

⑤表示上海译文出版社收入《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的葛林先生译的“扁的圆的人物以及‘角度’”(即《小说面面观》的第四章“人物(下)”)一文中的译文。

②③表示这两者内容相同的译文；

②③④表示这三者内容相同的译文。余类推。

3. 为了方便和节省篇幅，①②③④⑤有时还在脚注中分别表示各自代表的版本的译者或摘自他的译本的某段引文。

为了区别于附在每页底部的脚注，在每一章结尾处另有尾注，意在帮助读者理解原文或译文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者向读者解释或说明译者认为需要读者注意的问题。尾注以小一号的中文数字〔1〕，〔2〕，〔3〕，……标志，分别附在加尾注的词语或文句的右上角。尾注的内容则以与之相应的中文数字依序排列在每一章正文的后面。

# 译 序



先说说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 的由来——这位著名的英国小说家怎么会写这部“被世人目为既是一部关于小说理论的研究专著，又是一部语言非常生动的散文作品”的。<sup>[1]</sup>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 – 1970) 生前有个习惯：每到年终岁尾，他总要在日记簿里写上一段，回顾他在过去一年里的成败得失。在 1927 年的年终总结里，他写道：

对过去艰难一年的回顾令我感到愉快……，并认为它为今后获得金钱和声誉打下了基础……。这讲座（从一月延续到三月，讲稿十月出版）获得成功。艺术讲堂里听众踊跃，聘为国王学院研究员。<sup>[2]</sup>

他在这儿提到的那个讲座，就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办的克拉克讲座。<sup>[3]</sup> 在英国各大学和机构定期举办的所有关于英国文学的专题讲座里，就数这个讲座享誉最隆。它每年举行一次，由三一学院的专设委员会邀请一位久享盛名的文坛泰斗或者学术界的元老或巨擘前来主持。以前这个荣誉却似乎和小说家无缘，应邀前去主持讲座的都是诗人、戏剧家、文艺评论家和史学家。然而，在 1926 至 1927 这个学年度里，三一学院却一改沿袭已久的惯例，破天荒地邀请了一位小说家前来主持这

个竞争激烈的讲座——他就是曾在 1924 年发表了小说《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而声誉鹊起的小说家福斯特。

三一学院的邀请书是在 1926 年 3 月间发出的。福斯特收到了以后，不由得忧喜参半。他在同年 3 月 17 日写给一个印度朋友的信里说道：

我刚收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寄来的一封信函，邀  
我前去主持克拉克讲座——时间预定在今秋或者明春  
——就英语文学方面的一个题目公开发表八次演讲。  
酬金颇为丰厚，高达二百镑之多。如果我鼓得起足够  
的勇气，我将接受邀请。<sup>[4]</sup>

这邀请显然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主持克拉克讲座不仅可使他获得丰厚的酬金，而且会成为一条助他通往名誉和地位的捷径。显而易见，如果他应邀主持了克拉克讲座，一旦他的演讲好评如潮，他就将“跃登龙门”，跻身于文坛名流之列。<sup>[5]</sup>

可是，起先他却对此犹豫不决。其原因不难理解。正因为这个讲座享誉隆，规格高，前来听讲的人必然都是学有专长的权威和声望甚隆的学者。福斯特心里明白，他既然以创作小说知名于世，听众必然会期望他讲讲和小说密切相关的题目。可是实际上，虽然那时候他已经发表了七部小说，但书评只写过短短的几篇，而且从未对小说的创作理论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富于真知灼见或创新精神的专著。他甚至曾经公开反对任何人在小说创作技巧的问题上说三道四，反对他们制定什么规则，探索什么规律。<sup>[6]</sup>

显然，除非他愿意在小说的创作理论和写作实践等方面进行系统而艰苦的探索和准备，否则，尽管他有丰富的创作经验，<sup>[7]</sup>他的演讲也难免会被识者所笑——尤其他的许多同行，那些小说家们。他们一定不会错过这个看他出丑的机会。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福斯特终于毅然接受了这个邀请——或者不如说这个挑战——并立刻着手准备起来。他系统

而仔细地阅读了十八世纪以来所有重要的小说，其中包括英国小说家和某些外国小说家的作品。他写下了详细的读书笔记，记下他对一些小说的感想和意见。他请几个作家朋友开了一张又一张供他阅读和参考的书单。他读得非常认真，非常勤奋，因为他决心全力以赴，一定要使由他主持的这次关于小说的克拉克讲座受到热烈的好评，获得圆满的成功。

福斯特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的演讲大获成功——简直可以说：他成绩辉煌。讲座的帷幕刚落，立即好评潮涌。在他写给朋友们的信里充分地流露出他那如释重负的感觉，以及喜出望外的心情。起先，他在一封信里提到，讲座开始以前他觉得“受宠若惊”。继则他说他的第一个演讲产生的反应要比他所“期望的更为良好”，而第二个演讲结束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些演讲在剑桥的知识界里得到了广泛的成功”，到了第七讲，他认为他的讲座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到了最后，他说它业已取得了“最最辉煌的成就”，以致他在信里不得不对他的朋友们表示歉意，“由于我声誉日隆，现在忙得简直无暇写信了”。

由他这位英国小说家主持、以英语小说为题、在 1927 年秋举行的这次克拉克讲座既然在英国的学术界和文化界获得了迅速而具有轰动性的成绩，他迅即做出果断的决定：立刻把他 的讲稿整理成文，予以出版，取名为《小说面面观》。

此书一问世，立刻受到英国学术界和一般读者的热烈欢迎。

首先，它的内容非常新颖，立论十分精彩。你几乎在每个章节里都会发现一些精辟而独到的见解。不少关于小说的创作实践、小说的欣赏和评论等方面的老问题，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崭新的、富于启发性的解答。如小说中人物之“圆型人物”和“扁型人物”的分类和特征，又如小说中的“故事”和“情节”的区别与关系，以及“模式”和“节奏”在小说里的功能，小说中的“幻想”和“预言”的作用等等，他都提出了明确而有说服力的创见，解决了许多已经困扰小说家和小说理论

家多年的问题。尽管其中不少只能说是他的“一家之言”，有些还引起了程度不同的争论，但《小说面面观》逐渐成为反对过于重视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反对否定个性化创作活动的所谓“技巧至上论”的先驱。小说美学的理论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因此它对现代小说各流派之形成和成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再则，他的行文措辞深入浅出，把一些专业性强、繁复深奥的学术理论，化解为明白易懂的家常话，简单明了，简直妇孺能晓。他在文中随时提供的许多通俗、生动而且典型的例子，均为一般读者喜闻乐见、耳熟能详，读来让人印象格外深刻，不由得对他正在阐述的理论加深了理解与认同。

其次，作为一个笔耕多年的小说家，福斯特深知创作之甘苦，因此他在书中提到的他对许多小说家及其作品的评论，自有其深刻而独特的价值。他对艾米丽·勃朗特、赫尔曼·梅尔维尔、戴·赫·劳伦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等知名作家和他们的一些作品的评论和见解，无不对后人的研究和创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为他们提出了崭新的探索思路和写作方向。

再者，《小说面面观》是由讲稿整理成文的一部专著。它的观点鲜明，文辞生动。原来福斯特不但是一位大小说家，一个语言大师，而且还是一个善于辞令的演讲高手。他的论述条理清晰，不蔓不枝，深入浅出，富于形象，而且出言吐语诙谐幽默，讲到关键之处，不忘妙语解颐，随时牢牢抓住听众或读者的注意力。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他所主持的克拉克讲座不但吸引了众多的听众——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如诗人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 1859 - 1936)，文艺评论家李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 1895 - 1978)等等——而且始终盛况不衰。讲座之后，由他本人修改成文的《小说面面观》，完全保持了他演讲稿中的这许多优异的风格和情调，因此，当这一讲稿出版成书，影响也就更加广泛和深远。

然而，作为一个讲座，或者作为一部以他的讲稿演绎成文

的专著，《小说面面观》也曾引起一些争议——有些争议甚至延续至今，正反两方仍互有胜负。譬如，福斯特在提到英国的知名小说家司各特的时候，一面固然盛赞他善于在小说中讲述故事，利用层出不穷、纷至沓来的悬念，让他的读者专心致志地听他接连不断地讲下去，以致无暇顾及或者发觉他的故事讲得多么荒唐无稽，故事里发生的那些巧合众多的情节多么虚假可笑，那些貌似前程远大的人物多么虎头蛇尾，往往落得个不知所终，一面他却在讲台上和书本里公然向他的听众和读者挑衅，说什么“司各特是一位会使我们的意见发生严重分歧的小说家”，说司各特在他的小说中挑出了许许多多放了出去、收不拢来的线索，等等。<sup>(8)</sup>当时他的这番话不免使学术界和舆论界为之震动，尽管后来有愈来愈多的人赞同他的观点。又如他把享有盛名的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仅仅当作一个“一味进行说教的小说家”来议论，也使当时的许多艾略特的崇拜者对此议论纷纷，怫然不悦。至于他对亨利·詹姆斯进行的所谓“攻击”，说这位被人尊奉为大师的小说家和理论家，为了要达到某种艺术的境界——据说主要是为了使一部小说的内容达致统一和趋于完整——竟然不惜“牺牲”生活里的“真实”，“来达到他的创作目的”，这番话更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sup>(9)</sup>原来福斯特为了寻找帮手，还引用了赫·乔·威尔斯的那段写得十分精彩、但是未免过甚其辞的嘲谑亨利·詹姆斯的文章，意谓詹姆斯非得把现实生活里的大部分素材排除在他的作品之外不可，否则这位大师就根本写不成他的小说。他的这番议论未免有欠公允，失之偏颇，因此惹得大师的门徒纷纷撰文驳斥，世界各国的文坛还因此而着实热闹了一阵。

比较公允的评论家可以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为代表。他是研究福斯特的重要学者和专家之一。<sup>(10)</sup>他在切尔西出版社(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7年出版的“现代评论观点丛书”(Modern Critical Views)之一《爱·摩·福斯特》一书中，撰写了那篇名为“心灵和意志：福斯特的文学评论”的文章，显然被文学界和评论界奉为圭臬。他在文中

固然对福斯特所持的某些观点感到遗憾，认为未免失之偏激，但他仍然认为，“它们之所以有失公允，不是他误入歧途的结果。他在评论时所持的观点和遵循的道路是正确的，只可惜他沿途进行观察的那个面稍嫌狭窄，视野不够广泛开阔，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未免偏颇。譬如他对司各特的评价，“未能从这位小说家的作品之单调乏味的表面现象深入进去，达到他那丰富而光耀万丈的才华中去，因此与其失之交臂……”他也“未能越过那些显然被司各特描写得贫瘠枯槁的贵族人物的头顶，观察到小说中那些地位低微的小人物生动可喜的幽默情调……”特里林此外还在文中对福斯特所持的关于亨利·詹姆斯的论点颇有微词，认为“这一结论可不再是观察视野不够宽广的问题，而是更为严重的才华稍逊，以致理性判断错误所致”。

然而，特里林尽管指出了福斯特的一些“不足之处”，可他笔锋一转，在文中兴冲冲地大谈特谈起《小说面面观》的种种优点来：说它“充满了最最深邃细致的洞察力”；“对托尔斯泰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广袤无垠的空间感所产生的美学意义和道德意义具有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以及“他提出来的关于小说家和美之间的关系，乃道出人所未道之真理：小说家固然永远不应把美作为他创作的目标，但是如果他的作品不能达到美的境界，他就算失败”；“福斯特对小说家的‘声音’提出的看法乃系小说批评界所从未接触过，更不要说如此深入地探讨过的一个课题”，以及“认为梅尔维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出现的间歇性写实主义文笔的欣赏价值为：赋予小说一种特征，总会使一部艺术作品具有一些挑逗性的素质，即‘表面的起伏’”，等等，等等。特里林最后做出他的“判决”：他在此列举的《小说面面观》的论点，均足以证明福斯特拥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批评家素质：优异而卓越的文学洞察力。他认为，“惟有独具慧眼的批评家，才能做到这一点：居然在对乔治·艾略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小说家进行比较的时候，做出一个光耀万丈的结论——前者是个说教者，而后者是个预言者。不但如此，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对伪学者的描绘

和评述，显示出若非对我们的文化现状具有真切而勇敢的敏锐思考和深入观察，是不可能有此非凡见解的。”

总之，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问世以来，几乎已被举世公认为是作者对一个公众广泛对之有着兴趣的题目，直言不讳地阐述见解的文学评论专著。福斯特不但借鉴了前人的创作和研究成果，而且凭着他自己二十多年创作实践积累的经验，就小说许多重要的方面和关键问题做出了发人深思的、富于创新精神的总结。事实证明，《小说面面观》已经对小说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普遍而富于指导意义的作用，被广泛尊奉为二十世纪研究小说艺术的经典著作之一。从它问世以来，《小说面面观》在半个多世纪里印行了数十版，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影响所至，遍及世界各国。



简单介绍了福斯特写《小说面面观》的缘由，以及它在世界各国普遍受到重视和欢迎，它的翻译和出版盛况不衰的情形，再说说我国翻译和出版这部名著的概况。

现将译者所知的《小说面面观》迄今被介绍和翻译的情况简略介绍如下。

它在我国的翻译、介绍和出版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根据我手头的那几种书籍看来，迄今在我国海峡两岸似乎出版过下列数种译本〔其中一种系被选入《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中的一章〕：

1. 台北志文出版社于 1973 年出版了在台湾某大学西语系任教的李文彬先生的译本（新潮文库 90），1973 年初版、1986 年再版。印数不详。

2. 广东花城出版社于 1981 年 7 月出版了“内部发行”的译本，内容和李文彬先生的译本完全相同，只是改用简体字和横排而已；未署译者的名字。印数不详。

3. 广东花城出版社在 1984 年 12 月出版了苏炳文先生的译本，第一次印刷，印数为 81,000 册。
4. 广东花城出版社于 1987 年 7 月出版了苏炳文先生译、黄锡祥先生校的《小说面面观（修订本）》，第二版第二次印刷，印数为 6,280 册。
5. 上海文艺出版社于 1990 年 4 月出版了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的《小说美学经典三种》，方土人先生译的《小说面面观》被收入其中，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为 2,500 册。
6. 上海译文出版社在 1987 年 2 月出版了戴维·洛奇编、葛林等译的《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内有葛林先生译的《扁的圆的人物以及“角度”》〔即《小说面面观》的第四章“人物（下）”〕的全文，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为 8,600 册。

我对《小说面面观》中译本的兴趣和关心，起先是为了教学方面的需要。

自 1986 年起，我在上海师大文学研究所给外国文学硕士研究生开设了英译中的翻译实践课。在教学过程中，我先后把这几种译本和原著对照着仔细研读了几遍，惊讶地发现，这几种译本里都有许多错误——有些还是荒唐可笑的，不应出现在惶惶巨著的译本之中。

低劣译品之为害，由来已久，翻译界和文坛的有识之士，莫不为之痛心疾首。究其原因，显属译风不正，且长久未获纠正所致。长此下去，实在令人担心。钱锺书先生说：“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sup>(11)</sup> 读了上面提到的那几种错误百出的译本，译者对此颇有同感，并为《小说面面观》和他的作者福斯特叫屈不迭。因此热切地盼望海峡两岸会出现一种无愧于我国翻译界的译本。可是至今《小说面面观》的中国读者，除了有机会

得到英文原版并能直接阅读的人，都得辗转呻吟于那些错误迭出、无法卒读的译本之下，无可奈何。惨的是，他们连做梦也没想到那是吃了译者肆无忌惮的那支“译笔”的苦头，反而自怨自艾，只怪自己学识太差，慧心欠缺，才落得个读得似懂非懂，不懂装懂，将之生吞活剥的下场。可是，奇怪的是，长久以来，怎么会大家全都听之任之，无人过问，以致那些蹩脚的译本得以畅行无阻，得意于神州大地？！这一不正常的现象，要到何时方能得以改变？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拙劣的译文将被当作过街老鼠，无处躲藏，更无市场。

可是，错误迭出、荒唐可笑的译文，有时还有另外一种功用。钱先生在同一篇文中提到：“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诗人。”我所见到的《小说面面观》的五种译本的若干地方，就有可能产生钱先生提到的这一作用。

当我对照着原文把上面提到的那几种译本仔细阅读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荒谬或令人费解的言辞或文句不是出自福斯特之手，而是这几位译者不敢恭维的译笔——他们有时不懂装懂，异想天开，信笔瞎编乱造；有的过于自信，自以为对原文的微言大义已经了然于胸，其实连边儿也没有摸到，就落笔成文，一挥而就。谓予不信，有白纸黑字印就的译文例句为证。从难以计数的错误中试举那些比较低级、幼稚、荒唐的例子，以供读者一笑——且慢，还是让读者自己到这本书的脚注里去寻找吧！读者会在找错纠偏的劳动中获得意外的收获。

前面提到的那些译本的译者，均系英语文学的学者或教授，怎么可能会译出如此荒唐的译文来，而且有的竟然会被一版再版（也就是说一错再错，不去修订），有的译文竟然堂而皇之地被选为“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的《小说美学经典三种》里的一种。可是译文里有那么多严重的错误，以致不得不替他们感到汗颜，不得不为我国的翻译界现状担忧，也替那些不谙英语、完全仰仗中文译本来阅读此一享誉国际文坛名

著的读者叫屈，为那些看不到原著的莘莘学子或学者惋惜，他们读了那些译文一定会满腹狐疑，不知道福斯特为什么写得如此玄妙深奥、不知所云，甚至还会大呼“上当”，从此对外国名家的著作敬而远之。

因此当我读到董乐山先生在为杨自伍先生主编的《美国文化选本》的“序”里提到出英汉对照的“文学译本”的主张，就产生一个想法：能否编译一本英汉对照本，不但为读者提供英文原著，同时也把自己的译文和我在不同译本中发现的错误及欠妥的译文，以评注的形式附在原文每一页的下面，任人指点、比较、评说。<sup>[12]</sup>尽管我以前一直忙于教学或翻译，可我一直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当然，这种书似乎从未有人编过或出过。

感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愿意为我提供出版英汉对照本的机会，为我国的广大读者提供一本任人指点和评说的《小说面面观》的中译本，同时以此还作者福斯特一个公道：让配有原文的拙译产生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我国翻译界的评论和重视。我深信，更好地表达福斯特原著的确切涵意、文采和神韵的中文译本，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于我国的译坛。我殷切地盼望那一天早日到来。如此，我方才算是做了一块铺路的砖石，替我国的翻译界做出了一点点贡献。

同时，怀着奇文共赏、公诸同好的殷切心情，我在现有的几种译本里匆匆摘出的一些译文句子或词语以脚注的形式分别排列在每页的底部。关于本书的注释形式和作用，请看“注释范例”。

本书的译文主要根据由作者福斯特亲自修订过的阿宾裘版本(The Abinger Edition)译出，该书由奥列弗·斯塔莱勃拉斯(Oliver Stallybrass)编辑、英国“企鹅丛书”(Penguin Books)于1976年初版，以后一再出版发行(据说各种版本迄今累计已经销售了一百万册以上)，并于2000年被列为“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之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现若干有疑问的地方，则根据自己的判断，按照美国 Harcourt, Brace